

一 思孟学派：儒家的 “ 正 统 ” 学 派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提到中国文化，谁都会想到孔子和孟子这两位儒学大师。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孟子对弘扬和发展孔子学说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实，在孔、孟之间，还有一位在当时颇负盛名的儒学领袖，他就是孔子嫡孙孔伋，即子思。

孔子在世的时候，弟子众多，门墙繁盛，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形成了一个儒者集团。他们研讨历史，修习礼乐，评述时事，主张用先王之道教化世人，希望人人自觉修养，以使家齐国治，上下有序，社会安定。孔子是一位“博学”之人，孔门弟子有不少人深切感觉到孔子思想的高深，认为“夫子之道至大”，因而要准确、完整地理解孔子学说亦非易事。当时就有人担心孔子以后“弟子人人异端”。由于个性的差异或者理解上的不同，孔子弟子在传述孔子学说时难免各有侧重。事实上，孔子以后，孔门后学真的出现

了不同的学派。《韩非子·显学》记韩非之言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儒家八派是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争夺正统地位时先后出现的几个派别。实际上，孔门弟子在接受孔子学说方面的确各有重点，有的侧重传经，有的着重弘道，有的则自觉在生活中实践孔子学说。

孔子去世后，子思对于整理孔子遗说，传承孔子思想，发扬儒家文化做出了极大贡献。孟子曾经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是子思的再传弟子，子思从孔子那里继承并发展的思想学说，对孟子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他们有师承和思想上的联系，故后人以“思孟”名其学派。思孟学派是战国时期儒家影响最大的重要派别，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几乎被湮没的儒学宗派

说到思孟学派，会令人生发出许许多多的感慨。认真检讨中国学术思想史，还很少有哪一个学术宗派像思孟学派那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与之同时，它竟然又是一个迭遭怀疑的学派。

思孟学派的这种特殊命运，还应当从孟子所处的那个时代说起。

作为学派，人们把子思与孟子联系到一起，显然是看到了二人学术传承上的种种联系，其中既有师承系统上的关系，更有思想内容上的联系。可是，《韩非子·显学》在叙述孔子以后的“儒家八派”中，虽然既说到了子思之儒，也说到了孟氏之儒，却并没有谈及思、孟之间的关系。

韩非依据怎样的标准来划分“儒家八派”，韩非所说有没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如果有，他们各指何人？这所谓的“八派”似乎并不处在同一时期，即使大致处在一个时期的“派别”，照理还应有影响更大的孔门后学。一般认为“颜氏之儒”是指师宗颜回的一派，但在韩非的叙述中，“颜氏之儒”在“子思之儒”之后。“孟氏之儒”中的“孟氏”应当就是孟子，而最早的“子张之儒”与“孟氏之儒”竟相差百年以上，更何况，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乐正氏之儒”指的是孟子弟子乐正克。看来，“儒家八派”很可能就是孔子去世后孔门争正统时先后出现的几个派别。

与《韩非子》不同，《荀子·非十二子》中谈到了不少学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中评论子思与孟子说道：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

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瞽儒嚙唯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在这里，荀子批评了子思、孟子，认为他们取法先王而不知道纲领，看起来好像从容不迫，才多志大，见闻博杂。他们按照往古旧制，臆造“五行”学说。荀子认为思孟五行学说非常怪诞而不伦不类，神秘而难以通晓，晦涩而不易理解。荀子批判其他学者思想皆中其主旨，看来，五行学说应该在思孟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今天看来，荀子的观点显然失之偏颇，它反映了儒家学派内部对于儒学理论的不同认识。作为亲身受学于孔子的人，孔子的弟子们对孔子思想和学说应当有更真切的了解，他们把自己从孔子那里听到的言论记录整理，其间或有“润色”的成分，但作为尊敬与崇拜孔子的后学，决不会凭空臆造孔子言语。子思是孔子嫡孙，有比孔子弟子更为特殊的身份和优越条件，他把孔子遗说搜集整理，尽力推广，应该是情理中事。孔子生前孜孜以求的正是推行自己的思想主张，孔子以后，孔子与儒学的影响更大，子思和孔子弟子自然不会任凭孔子之言散失而坐视不管。

荀子与孟子大致同时，他们都曾游历齐国的稷下

学宫，荀子还多次做过稷下学宫的“祭酒”，主管其中事务。孟、荀同属儒家，都具有重要影响，司马迁作《史记》时将他们写在同一传记中，孟、荀的思想主张却有明显区别。孟子是邹鲁人士，与子思有学术上的关联，他自然像子思那样宗师孔子，言必称孔子之言。荀子反对孟子，把孟子称为“俗儒”，自己则以“大儒”自命，在儒家学派中别立一宗。在继承孔子的同时，荀子又批判和改造了正统儒家思想，没有像孟子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子思门人的师承系统，也看不惯子思、孟子动辄称述孔子之言的做法，为了反击孟子，便认为是他们影响了后来世间愚蒙的儒者，歪曲了孔子的学说。

荀子对子思、孟子的批评正昭示出思、孟之间的学术关联，作为一个儒家学术宗派，思、孟之间具有相同的学术取向。但是，作为一个“学派”，“思孟学派”可能并不像后世一般意义上具有一定组织系统的宗派，有学者认为“思孟学派”是“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的合称则很有道理。

在有关的叙述中，无论韩非还是荀子，他们都没有说到“学派”这个字眼。但是，韩非所言及的各家，都是先秦儒学传承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韩非没有说到各家之间的关联，但荀子却说到子思、孟子先唱后和，主张“五行”学说。荀子还说子思、孟子的唱、和受到一批儒者的拥护和响应，当时已经产生

了重大影响。作为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的儒家学者，荀子所言肯定不会是空穴来风，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从本意上，荀子更多地看到了思、孟之间的唱、和，可能无意说他们为同一学派。不过，后人所说“思孟学派”却来自荀子此言。

前面引述的《荀子·非十二子》中，“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一句的“子弓”原作“子游”。清朝的学者如俞樾、郭嵩焘、王先谦都认为这里的“子游”是“子弓”之误，因为荀子多次说“仲尼、子弓”，并没有言及子游。本篇最后说到“子游氏之贱”，同时也说到“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荀子将他们一起讥刺，“子游”应该是“子弓”之误。

但也有人没有看到《荀子》这里所记的错误，如郭沫若先生认为，别处屡屡说到“仲尼、子弓”，是荀子自述其师承，而此处独独说到“仲尼、子游”，乃子思、孟子的道统。实际上，这是郭沫若先生的误解，俞樾、郭嵩焘等人的看法是对的。“子弓”其实就是孔子弟子冉雍，冉雍字仲弓，荀子尊称为“子弓”。新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三册）的《仲弓》篇提供了研究子弓的新材料，《孔子家语》中也有专门记述孔子与仲弓对话的《刑政》篇，这些材料与包括《论语》在内的其他材料结合起来研究，不难看出仲弓与荀子在思想上的一致性。

《荀子·非十二子》所说“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说人们认为孔子、子弓由此而见重于后世，并没有说到什么“子思、孟子的道统”。

对思、孟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孔子和曾子，子思自幼亲受孔子之教，孔子去世后又学于曾子，与子游并没有太多的联系。阅读有关典籍，可以发现子思、孟子很少谈到子游，而谈到曾子之处则很多。《孟子》一书九次提及曾子，书中还明确说到子思与曾子的师承关系，孟子与曾子在思想上也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

关于孟子与子思的学术联系，汉代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师承关系。唐宋以后，随着“道统说”的出现和兴盛，思孟学派开始与道统结合在一起，被一致认为是儒家道统的传递者。韩愈始创的道统论，包含礼乐教化、天下一统、君臣纲常等多方面的内容，强调仁民爱物的德治精神，注重王道精神的一脉相承，及其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实行德政，修己以治人，正是思孟学派的主张，恰恰契合韩愈以后理学道统论者所注重的内在心性问题的。虽然人们对思孟学派有各自的理解与阐释，但大致说来，重视《四书》，重视“性与天道”是那时期的基本学术特征，思孟学派始终受到格外的关注。

历史的发展往往如此，当一种思潮真正成为思想潮流的时候，总有一种逆流或大或小地与之相伴。思

孟学派受到重视的同时，一种否认思孟学派的倾向也开始抬头。宋明理学本来是为了明义理而有别于汉唐注疏之学，但在客观上也开创了学术研究中的疑古思潮，造成人们对传统文化和典籍的普遍怀疑。例如，子思作《中庸》就受到大学者欧阳修的质疑。据说，清朝乾嘉考据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戴震长到十岁时才能说话，可是刚学习《大学》，就对朱熹所说《大学》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对“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表示怀疑。他向老师质疑，认为周朝、宋朝相去两千年，朱熹的话不应相信。经过清朝学者的考证，《大学》早出靠不住，出现的时间应当很晚；《中庸》中的“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语，证明该书应成书于秦朝统一以后，自然不是子思所作。这在后来的学者中影响巨大。

清朝学术的兴盛与清儒不满于宋明理学的空疏有关。清儒割断了曾子、子思与《大学》、《中庸》的联系，也就摧垮了理学家的理论基础，宋儒宣扬的道统论同样也就成为问题。例如，为了反对宋儒空谈心性，不少学者提倡践履，有学者提出“圣门之学者重约礼，礼者理也”，甚至有人提出曾子的学术“湛深于礼”，在孔子那里，“一以贯之”的不是“忠恕”，而是“礼”，曾子得孔子之传也主要在于礼。又如，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康有为误解《荀子》，以子思之学出于子游，而非出于曾子；子游著有《礼运》，孔子

的“大同”政治理想出现在《礼运》中，他由此认为：“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子思孟子之学实由子游以受孔子”。

这样，学者们对《荀子》所言思孟“五行”之说抱有疑虑，人们不清楚“五行”何指，便不了解思、孟思想的内在关联，从而也对“思孟学派”的存在难以肯定。疑古学者割断了曾子、子思与《大学》、《中庸》的联系，子思、孟子的学术来源又被“改道”，子思的思想更失去了典籍的依据，思孟学派的有关问题遂显得更加扑朔迷离、疑团重重。

（二）思孟“五行”之谜

新学问的兴起常常与新资料的发现相伴，学术的进展，尤其是历史问题的研究，对资料有很大的依赖性。在疑古思潮影响下，许多学术问题被搞得一团模糊，不过，在新的材料面前，原来许多重大争议的问题，都能借以得到决断。思孟“五行”问题便是一个很好例证。

《荀子·非十二子》批判了思孟“五行”同时，也给后世留下了千古之谜。思孟“五行”何指？荀子为何批评思孟“五行”？这是两个密切关联的问题。不明白思孟“五行”的具体内容，就难以了解荀子为何

么批评思孟“五行”？

荀子所说既然不会是空穴来风，则思孟“五行”必有所指，学者们的探索热情由此被激发出来。唐朝学者杨倞注《荀子》说：“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说，谓之五行。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也。”近代以来，学者们继续研究，提出了种种新说，如章太炎认为五行的内容即水、火、木、金、土与五常相配；郭沫若认为思孟“五行”就是仁、义、礼、智、诚五德；谭戒甫认为五行“是后世所谓五伦，这在《中庸》、《孟子》二书都可寻出根据”顾颉刚则干脆认为荀子批驳的不是思、孟而是邹衍的五行。

思孟“五行”到底何指？这一谜底被揭开，缘于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帛书。在这批新发现的文献中，《老子》甲本卷后附录有四种古佚书，庞朴先生经过研究，将其中佚书之一命名为《五行篇》，认为其中谈到的“仁、义、礼、智、圣”就是人们争论不休的思孟“五行”。在帛书中，仁、义、礼、智、圣五种被称为“德之行”，即“五行”，其中的仁、义、礼、智称之为“四行”。仁、义、礼、智、圣也见于《孟子》书中，可见，子思、孟子确有“五行”说。不难看出，以前学者将思孟“五行”与儒家倡导的德行联系起来的思路是正确的，而将它认为邹衍的五行则与实际相距甚远。

庞朴先生借助于马王堆汉墓帛书揭开了思孟“五

行”之谜，但疑古思潮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有学者仍然不能同意这样的认识，也就是说，对思孟“五行”这种新的理解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

早期文献传流有其自身的特点，尤其在秦汉之际，学术传承往往私相授受，竹简帛书辗转传抄，个别文字出现差异是极其正常的事情。可是，由于资料有限，人们未加细辨，遂出现了影响极大的汉人“造伪”的认识。这样，许多本来时代清楚的资料，人们依然不能相信，还有一些源自孔子的儒学文献，其中明明标有“子曰”，显然是传述孔子学说，人们仿佛视而不见，不仅不能相信其时代，甚至连其学派属性也表示怀疑。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帛书“五行”说的认识也很难达成一致。

值得庆幸的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墓葬中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楚国竹简，其中就有《五行》篇，清楚标明了“五行”，使思孟“五行”研究得到彻底改观，庞朴先生当年的判断最终被证实。

郭店楚简《五行》篇的问世，也引发了对思孟“五行”说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子思上承孔子、曾子的心性论，对心性、性情的本原、相互之间的关系做了细致的发掘。子思认为，既然人性是人的本质，人性的载体是心，那么，只有使心中具有各种善德，才能使人的行为符合善的要求。竹简《五行》篇把仁、义、礼、智、圣作为五种德行，称为五行。子

思认为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德行的人，符合人道的基本要求；具备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的人，符合天道的要求。“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谓之君子”，内心流行“五行”之德，外在实践“五行”之德，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可见，子思五行说十分重视仁、智、圣等内化为心中之德的过程。

中国“五行”观念产生很早，最初的“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种自然界的物质元素。子思的“五行”思想的最早来源可推至《尚书·洪范》篇。《洪范》“九畴”是西周初年箕子回答周武王的治国之策，《洪范》以“度”为治国原则，强调君主的言行要有限度，强调中庸之道。李学勤先生认为子思《中庸》“唯天下至圣”一段本于《尚书·洪范》篇。《孔丛子·论书》记载孔子评论《洪范》说：“《洪范》可以观度……吾于《洪范》，见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恶而质人之美也。发乎中而见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范》乎！”孔子的评论正中《洪范》主旨。

在春秋战国之际，“五行”思想已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曾子也曾经将“五行”与人的身体进行结合，《吕氏春秋·孝行》记曾子曰：“五行不遂，灾及乎亲，敢不敬乎？”他从孝亲出发，以修身论至养身，已经把五种德行称为“五行”，并引述春秋以来自然五行与人文相互结合的盛行观念作为自己的论据，详细阐发了自然五行与修身的关系。子思从《洪

范》自然的水、火、木、金、土五行与五事相结合的思路出发，借助曾子的“五行”论，建构了自己的“五行”说。

关于“五行”，《孟子·尽心下》记孟子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应该是孟子“和”于子思的具体言语。子思“四行”与“五行”的划分，即人道与天道的划分，既具现实操作性，又有形而上的终极性。他把仁、义、礼、智定为做人的基本道德，开启了孟子的“四端说”，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经过从子思到孟子理论上的探索，从孔子、曾子那里继承来的思想学说大都得到了发展，并最终完成了理论上的建构。无论《五行》中表现的子思思想还是《孟子》中显示的孟子思想，他们都突出并强调“仁”，与强调“形于内”的“德之行”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孟子淡化了五行说的神秘性，把儒家思想阐释为和谐的“王道”政治，以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修身理论，刚毅勇猛的君子人格，由成就“内圣”而成就“外王”。

(三) 古墓带来的“新知”

思孟“五行”说真相大白，荀子所言子思、孟子二人之间的联系得到了确证。思孟“五行”说是思孟学派研究的关键问题，它的解决，使思孟学派的许多问题有了继续探索的可能。

然而，“思孟学派”给人的感觉似乎仍然朦胧。思孟学派是一个学术派别，按照荀子的说法，它是有很影响的学派，从理论上讲，既然是“开宗立派”的人物，子思也应该有内涵丰富的思想学说及其重大的历史影响。孟子的思想可以在《孟子》等书中找到答案，而子思的著作毕竟太少了。就像疑古思潮冲击之后的“孔夫子”几乎成为“空夫子”那样，作为战国大儒的子思似乎也空洞无物，无所附着。

关于子思著作，史书有明确记载，只是有的典籍已经难以见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引发了人们重新研究思孟学派，但仅仅这一篇，资料仍嫌太少，有关问题的探讨仍难继续深入进行。

1993 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被发现，该墓葬虽然经过数次盗扰，仍有 800 多枚竹简幸存下来，除了少数无字简，有字竹简有 730 多枚，而且大部分完整。经过整理，《郭店楚墓竹简》于 1998 年 5 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公布了这些竹简的图板和释

文。该书的出版立即引起海内外的普遍关注，掀起了思孟研究的热潮。

郭店竹简的著作属于儒家和道家。经整理者编连后，属于儒家的著作有《缙衣》、《性自命出》、《五行》、《尊德义》、《成之闻之》、《六德》、《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二、三等 13 篇。由于郭店竹简的形制不完全一致，除属于摘抄性质的三篇儒家《语丛》外，13 篇儒家简可分为三组：第一组 6 篇，《缙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第二组 2 篇，《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 第三组 2 篇，《唐虞之道》、《忠信之道》。

据发掘报告称，郭店一号墓属于战国中期偏晚，约相当于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公元前三世纪初。该墓位于楚国郢都以外墓地的范围之内，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这一带楚墓的时代序列已经排定，因此整理者对墓葬年代的推断应该是可信的。通过对相邻楚墓的分析，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断定郭店一号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4 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 300 年；竹简的书写应早于下葬时间，至于竹简著作的年代自然还要早些，均在《孟子》成书之前。

空前的发现带来了空前的研究热潮，人们欣喜于大地献宝，儒简重光，面对在地下掩埋了两千多年的早期儒家学术文献，面对这个曾经存在过的“哲学

的、思想的世界”，学者们纷纷利用新的学术信息，进行各领域的综合考察。

古墓竹书的“新知”，最重要的是使我们现代人看到了战国时期传抄的子思著作，看到了孔孟之间思想的过渡环节，打消了对子思学派存在问题的疑虑。从竹简的内容中，学者们发现一些篇章属于久已失传的《子思子》。例如，其中有原属于《子思子》的《缙衣》篇，有曾经在马王堆出土，记录思孟“五行”说的《五行》篇，更有明确提及子思的《鲁穆公见子思》篇。不难看出，这些著作的确属于子思学派。李学勤先生认为《缙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和《六德》等篇属于儒家子思一派，《细衣》等六篇应归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子》。他说：“这些儒书的发现，不仅证实了《中庸》出于子思，而且可以推论《大学》的确可能与曾子有关。《大学》中提出的许多范畴，如修身、慎独、新民等等，在竹简里都有反复的论述引申。……由此可见，宋以来学者推崇《大学》、《中庸》，认为《学》《庸》体现了孔门的理论理想，不是没有根据的。”学者们坚信，郭店楚墓中的各篇儒学著作，其价值都在今存《礼记》各篇之上，这对于理解子思其人、子思学说、子思之学与孔子的关系、“思孟学派”的思想特征等都有极大帮助。

郭店竹简的出土，使《中庸》与子思的关系问题

也得到了解决。中庸是指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这是儒家的道德准则和思想方法。

“中庸”最早出现于《论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这里，中庸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孔子以后，历代儒生对于中庸思想进行了反复阐释与发挥，使中庸之道成为儒家认识世界、对待社会人生的基本方法。而最早对孔子中庸思想进行系统阐述的要数《中庸》，该篇以“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和自然法则，讲述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在继承孔子中庸思想的基础上，把中庸与人性道德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竹简、帛书《五行》篇与《中庸》、《孟子》比较，可以在《中庸》、《孟子》中找出五行说的痕迹，进而确定《中庸》的确是子思的作品。郭店简中属于《子思子》的各篇竹简又与《中庸》有不少相通处，例如《性自命出》论及“性自命出，命由天降”，这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一致；《尊德义》的体例与《中庸》等也颇为近似。沈约曾说《中庸》取自《子思子》，而竹简中又有《鲁穆公问子思》，这些竹简儒书肯定都与子思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证实《中庸》出于子思。

《子思子》的发现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为《大学》、《中庸》及其它一些儒家著作提供了可靠联系，说明子思、孟子一系的确是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一个支